

府谷方言文化解读^{*}

李思民

(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陕西 宝鸡 721007)

摘要 方言,地域文化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晋语区”的府谷方言,既保留着典雅的历史文化,又透视出古朴的民俗文化,还蕴含着特异的民族文化,本文是从文化角度解读府谷方言的一个尝试。

关键词 文化;民俗;历史;民族;方言

中图分类号 J C95

文献标识码 J A

文章编号 J 1008-4193(2007)01-0083-05

阿拉伯人称:“谚语——语言中的盐。”谚语像盐一样,能调出蕴藏在语境中的百味。歌德在他的《诗与真》中也强调:方言土语是各地方“灵魂所借以呼吸的工具”,有朴素自然的价值。方言是地域文化最直接、最现实的表现,因此,审视流传在府谷群众口头的方言,便不难发现蕴藏在其中古朴深厚的文化积淀。^{[1](P93)}

府谷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的“晋语区”,以保留古入声为其鲜明的特征。陕西境内的方言可分为两个区,榆林、延安两个行政区的 19 个县市因保留着古入声,划分为陕北方言段,归晋语区;延安南部的 77 个县市则属于北方方言区。陕北方言段内,又以古入声从北到南依次递减,分为北片、中片和南片。府谷地处陕西北端,较完整地保留了古入声,使其与他地方言有显著的区别。审视如今还活跃在群众口头的府谷方言,就会品味出浓重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色彩,只有从这三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府谷方言。

历史文化的遗迹

方言是一种历史文化的遗迹。它一般不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政权的更替而除旧布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为我们借方言了解历史,探索已往

社会的生活、思想观念及其演变,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府谷人把种庄稼叫“受苦”,把种庄稼的叫“受苦人”。受苦一年,等待“受苦人”的不是喜庆、欢乐,依然是熬煎、痛苦,因而府谷人把“守岁”叫“熬年”。小孩出生后,先起个小名叫“奶名”,如“毛蛋”、“狗儿”之类,稍大或上学时,苦思冥想,郑重其事起个大名,叫“官名”,这是府谷人精神寄托、理想企盼的具体表现。府谷人称妇女为“扰乱朝”,显然是女人“祸水”论的地方翻版。至今,府谷人还把那些因行为不检点而引致家庭、单位、团体秩序混乱、人心涣散的人斥为“扰乱朝”,甚至直呼“苏姐(府谷人误读为 ta)己”。府谷人把不守规矩,做事越轨的行为叫“出国”,如长辈训斥晚辈说:“你不要出国啦!款款算了吧。”“出国”一词透视出封建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视其他国家为蛮夷小邦,斥西方科学技术为淫巧小技,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事实。府谷人称长得漂亮的女孩为“国香”(本地人读音为 xiāng)。“国香”一词无疑是“国色天香”的缩写,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唐代李睿《松窗杂录》引李正封《咏牡丹花》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诗:“此时逢国色,何处是天香。”元代贯云石

* 收稿日期 J 2006-09-10

作者简介 李思民(1945-)男,陕西凤翔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思维科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半鹤鹑·佳偶》：“国色天香，冰肌玉骨。”《警世通言》卷三二：“值十娘梳洗方毕，纤纤玉手，揭起舟傍短帘，自泼盂中残水，粉容微露，却被孙富窥见了，果是国色天香。”《镜花缘》三四回：“身上穿了蟒衫，头上戴了凤冠，浑身玉佩叮当，满面香气扑人，虽非国色天香，却是袅袅婷婷。”亦作“天香国色”。明代郑若甫《玉玦记·访友》：“他有个亲生的女儿，叫做媚奴，见在南瓦子佳，果是天香国色。”府谷人又称长得俊俏的大姑娘为“靛”，直呼“靛女子”。有些带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方言，只活在部分人群中，如“也么哥”等，这个元杂剧中常用的虚词，如今仍流传在府谷的小孩中间，成年人则很少使用，其用法和元杂剧也有所不同。元杂剧一般都用在句尾，像词缀，而府谷人则用在句首，像法语助词，引出要说的内容。有时则简称“也么”，男女小孩开口“‘也么哥’怎么样”、“‘也么’怎么样”，“么”和“哥”读轻声，听起来好像“爷怎么样”。尤其女孩子最爱说“也么哥”或“也么”。其他如“传牌”、“打前站”、“海上法”、“归位”等，都隐含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不少古汉语词汇，普通话中已不使用了，而在府谷人的口语里，甚至书面上却仍频频使用，其中既有实词，也有虚词。实词如：

1. 川：平坦之地。

《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崔颢《苏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

例：天这么早，川里的庄户还可以，梁闲上全撂啦。

2. 昇(yū)：抬。

《三国志·魏志·钟繇传》：“虎贲昇上殿。”

徐珂《清稗类抄·冯婉贞》：“未几，敌兵果昇炮至，盖五六百人也。”

例：这么沉，谁家爷爷拿得动，非众人昇不行。

3. 翳(yí)：遮蔽。

《楚辞·九叹·近逝》：“石嵯峨以翳日。”

欧阳修《醉翁亭记》：“树林阴翳，鸣声上下。”

例：前面那个大个儿坐下，翳得后面甚也看不见。

4. 村：粗野。

戴复古《望江南》诗：“贾岛形模原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习昆？”

例：尔格这女娃子也够村的，开口闭口爷长爷短。

5. 折割：折(音直)，断；割，宰割。折割，引申为致人死亡。

荀子《劝学》：“风至若折，卵破子死。”

桓宽《盐铁论·论儒》：“俨严以割烹事汤。”

例：狠一狠，就把你折割噃。

6. 戈(cǎn)：光着；仅，只。

刘克庄《春日 and 竹溪再和》诗：“戈骑犊子不施鞞，老退犹堪学力田。”

李煜《菩萨蛮》词：“戈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

例：戈脊梁马不好骑。

人家都走啦。戈留下你一个人不孤？

7. 鞞(bì)：马上备有鞍辔，泛指给大牲畜搭挂鞍辔。

王昌龄《塞上曲》诗：“遥见胡地猎，鞞马宿严霜。”

例：明尔格起早点，鞞上牲口往地里驮粪。

8. 顶真(府谷人读为“根”)续麻：“顶真”，上下句蝉联，“续麻”，即麻绳头尾连续之意，二者名异而实同，均指上句的结尾作下句开头的修辞格。这种古老的修辞方式，东汉乐府民歌《平陵乐》、李白《白雪歌送刘十六归山》等都用此格。府谷人把“顶真续麻”引申为前后承接之意。

例：咱这人手顶根续麻上来，不愁它翻不了身。

9. 说六国(六音落)：典故出自战国。苏秦、张仪以如簧之舌，分别游说六国，苏秦主张“合纵”，张仪主张“连横”。府谷人把“说六国”比喻为长于辞令，巧言善辩。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苏秦、张仪说六国，晏婴、管仲说五霸……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

例：哪怕他会说六国也不顶用，事实在那儿摆着哩。

此外还有，担“不是”(差错)、说“不然”(缺点、毛病)、“浑不为”(一丝不挂、光身子)、“忤(wǔ)逆子”(不孝顺的儿子)、“没计(jì)奈何”(没办法)、“落到原巢”(比喻回到起初的地方)，“但是”、“但求是”(差劲，不怎么样)等，不胜枚举。

虚词如：

1. 乎：“不离乎”，“险乎儿”。

2. 者：“一者……，二者……。”

3. 其：“其吃”、“其说”、“其余”、“弟兄其家”等。

4. 但:但、但凡。

5. 于:于,于中。

6. 所以然。(以上例略)

7. 将:助词,用在句中,使语句和谐匀称,可不译出。

《颜氏家训·治家》:“若生女者,辄持将去。”

例:天黑将来。

8. 长短:不论怎样,总之。

白居易《即事寄微之》诗:“饱暖饥寒何足道,此身长短是空虚。”

司空图《狂题》诗:“长短此身长是客,黄花更助白头催。”

例:那两个钱,下个月你长短兑了吧。

民俗文化的化石

方言不仅保留着历史的影子,还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通过方言,便能领略一方风土民情。府谷地处山区。人们世代代在山里生活、劳作,与山朝夕相处,终生为伴,对山有着特殊的感情。像熟悉自己的面貌一样,府谷人用“山”指称身体的器官、部位和地理方位。说鼻子是“鼻梁洼”、“鼻圪堵儿”,前额是“眉老圪堵”,发际是“头发畔(bàn)子”,眼的所在是“眼窝圪坨”。位于边、角的地方是“指拐”,突出了因山的阻隔要拐来拐去才能到达的地形特点。如“上梁头走一遭”(到上边走一回),用意亦同。府谷人给山里的各种地貌,起了各色各样的名字。如圪梁、圪蛋、圪墹、圪堵、圪坨、圪洞、圪崂、壕、峁、洼、塔、壑、畔、沟、渠、湾、等等。尤其“塬”字,字典,词典里都很难找到,府谷人却敝帚自珍,用它指称地方,命名村庄,如“沙塬”、“付家塬”、“石庙塬”等。

府谷人靠山吃山,靠山识山,也靠山说山。似乎他们活的就是一个“山”字,出言吐语常和“山”联在一起,“山”字用得很多。“那女娃穿得可山哩,山混混价。”“看那个山汉样儿,叫人说甚哩。”“山驴野马,不上串的话甚也说哩。”这里的“山”是“粗俗”、“粗野”的意思。“门限比山高”。“山不移,性不改”。“山”又成了难以逾越,变革的象征。府谷人还把重婚妇女在几处所生的子女(即同母异父),叫“夹山弟兄(姊妹)”。说话用字遣词离不开“山”,比事说理也围绕着“山”,开口闭口是与山关联的事物,如地形、畜牧、农作物等。像“地圪墹还有高低”(长幼有序)、“阳坡坡搭阴坡坡”(互用互补)、“羊毛出在羊身上”(互不相干)、“放了一辈子羊,能认不出狗和狼”(经验丰富,善于识别真伪)、

“骑驴不管车道”(个人利己主义)、“骑上毛驴寻毛驴”(自找烦恼)、“骡(Kuàng)马不上阵”(轻视妇女)、“一场糜子铺就绪啦”(已成定局,无法挽回)、“米里头也有颗糜子”(世上没有绝对的纯)、“一颗黑豆拌成两半”(彼此一样),等等,这些乡俚俗语,清新自然,含义深刻,妇孺皆懂,似清纯的山泉,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府谷县境西部,畜牧业较为发达。牲畜的称谓,分得十分精细。同是幼畜(禽),鸡叫“鸡儿子”,猪叫“猪拉子”,驴、骡、马叫“驹子”,半大猪叫“壳郎子”。雄性家畜,牛叫“犍牛”,驴叫“叫驴”,骡叫“儿骡”,马叫“儿马”,阉过的,马叫“骗(shàn)马”,驴叫“骗驴”;母畜,驴叫“草驴”,骡叫“骡骡”,马叫“骡马”,牛叫“舍(shāi)牛”;公猪叫“牙猪”,作交配用的种猪叫“骚猪”,专作生仔的母猪叫“窝猪”,南乡人叫“骡(Kuó)婆”。由于对畜类分得细,府谷人对牲畜的性能也了如指掌,连买肉也特别挑剔。既要分辨“公”、“母”(其中公羊脖子粗的,是交配过的,母羊盆腔大的,是生过羊羔的),买羊肉还要挑“山羯(羯音结,骗过的公羊)子”的,肉味灵(绵羊肉味腻),吃过地椒等百草的山羯子,肉味更香美。挑肉时还要打开腔子看,“腰子”(肾脏)摘了没有,千万不敢买“圪鞑”(鞑 dī,绵羊种羊,有臊气)的肉,更别提“骚胡”(山羊种羊,臊气更重)肉。假如有人以母猪肉(皮厚而粗糙,毛孔眼大而深)冒称好肉,那绝逃不过顾客精明的眼睛。另外,一些农具等称谓也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搭在大牲畜鞍子上的“驮(tū)桶”、“笼驮(tuò)、“架子”等及打谷场上的“连枷(jiā)等,“连枷”这种农具,最晚在宋代就广泛使用了,著名诗人范成大在《田园杂兴》诗中写道:“新筑场面镜样平,家家打稻乘霜晴。笑声歌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到天明。”府谷人不仅经济生活中保留传统的地域特色,而且民情民俗更显古朴。如“送面人”(每年夏历7月15日,家家户户用上等白面,凭女人们的巧手捏成鱼、石榴等,蒸熟后加以彩绘,馈赠亲友和12岁的小孩。“鱼”合“年年有余”,“榴”谐“留”,祝福小儿长留人世,长命百岁)、“打平伙”(秋冬农闲时,人们常常三三五五到光棍汉家里啦闲话,叨啦之余,大家凑钱或直接备办肉食或其他食品,平均打成份儿,吃个不亦乐乎)、“结拜识”(成年男子交朋友,生死相许,仿佛桃园结义一般,叫“拜识”,女人们叫“拜姊妹”)、“抓子儿”(孩子们席地围坐,用羊或猪指骨、石子等物作子儿,先就地撒开来,捡起一子儿,望

空抛起,然后迅速揽起地上其余各子儿,再把即将落下的那个子儿接在同一手中,眼疾手快,情趣横生)、“洗三”(婴儿出生后第三天,要浑身上下洗个澡,亲友前来致贺,谐合“喜三”,暗示喜庆)、“红朱腰(yāo)子”(红布做成无袖双层内衣,右首开口,用以保暖,避邪,妇孺老幼皆宜)、“催妆”(男方上门娶亲,带10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双头卷回的大馍,祝贺新人日后情意缠绵,永不分离,兼有催促新娘即早梳妆,上娇之意)、“添箱圆饭”(古时结婚的两种礼俗,流传至今。受请的亲友给聘出的女子赠送手巾、香皂、衣料等物,叫“添箱”;婚礼时,将受聘亲友开列花名单子,备日后新婚生儿育女时按单子请人,叫“圆饭”。古代作“添妆含饭”。《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鼓乐喧天响汴州,今朝织女配牵牛。本宅亲友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挺(tíng)床”(人死后,先要将死尸停卧在床上或门板上,然后“装穿”,祭奠)、“哭(府谷人读为“骨”)灵”(入葬前一天晚上,女婿守灵,吹鼓手哀乐声声,彻夜不绝,女儿们嚎啕痛哭)、“路祭”(埋葬后第三天,后来提前到第二天,家人、亲友到坟地扫墓),等等。府谷这些礼仪由来已久,明、清小说诸如《二拍》、《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著作中均有描述,足见其古老而富有地方特色。

民族文化的见证

历史上,府谷为边防之地,汉人与狄、匈奴、羌、靺鞨(蒙古)等少数民族,或杂居,或交战,或贸易,接触频繁,往来密切。境内的哈拉寨、麻地沟和沙梁曾为蒙汉交易的三大重镇。各族人民接触中,相互吸收对方的语言成分,使其举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据考,现在沿用的“大”(dá父亲)、“蛮婆”等是羌人语;“忽拉盖”(小偷)等是蒙语。县内西部乡镇、村庄等就有用蒙语命名的,如大昌汗、哈叶五素、石板大、敖包塬、高圪圪(kūilüè)渠等。这些词汇就是历史上民族接触、融合的产物。另外,府谷方言之所以具有民族特色,还有行政区划因素。从建置沿革看,府谷很长时间划归今天的内蒙古或山西。西周至北魏1700年间,属“北地”,即今内蒙古黄河流域一带。随、唐300多年间属胜州,治所榆林即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附近,辖黄河东拐弯一带,即今内蒙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托克托、和林格尔等地。五代到宋300多年间属河东路,治所并州,即今太原市,辖今山西沿黄河一带及陕西吴堡、佳县以北地区。到元、明后,才隶属“南地”。元、明属延安府,清以后属榆林府。辖区

隶属的变迁,必然影响到人事往来及经济文化交流,以致造成语言习俗上多民族的特色。再者,还有人口迁徙方面的因素。历史上,明代曾经大移民,“本县……土著汉族多由山右(即今山西省)迁来”(《府谷乡土志》)。清朝、民国直到解放后的“文革”,外出行商、揽工或逃荒、避难,府谷人多走内蒙,本地话管叫“吃北”。仅1947年(民国36年)大灾时,流入内蒙的人口就达数万人(1994年《府谷县志》),很多是举家出逃。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大规模人口迁徙,将迁出地的方言、风俗也随着带入迁入地;迁出者又常与原籍亲友探访往来,这是府谷方言与晋西北、内蒙古等地少数民族语言相近的一个重要原因。^{[2](P135)}

由于特殊的民族地域环境,府谷人最爱说“胡”字。形容那些不按规矩、随意乱来的言行为“胡说”,“胡嚼”(jiāo)、“胡来”,“胡日鬼”,“做胡事”;形容那些脑瓜子不精明、分不清好歹是非的人为“胡脑松”;形容邋遢、不修边幅的人为“胡烂宝”等,总之都带上了古代泛称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为“胡人”的印痕。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府谷人用数字给孩子起名字,如“王八十一”、“张七十二”、“刘三八十四”、“李二六十五”等,这很明显带有元代少数民族统治留下的影子。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用数字划分行政单位,每50家左右结为一社,并参照金朝把全国人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等的办法,在全国划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同时又把人分成九等,甚至把汉人编成号,以数字代名。府谷人今天仍用数字给孩子起名,就是这种历史的回光返照。不过,聪明的府谷人这种起名法,绝无种族歧视的意思,而是给这种数字名讳赋予了新意。譬如“李二六十五”,其意是指在爷爷或奶奶六十五岁时出生,在兄弟或姊妹中排行老二;“王四十五”,是指在父亲四十五岁时出生。这种数字名子,纯粹是一种纪念性的。用四位数起名,已突破了汉人用两个字或三个字起名的习俗(复姓除外)。由此演绎下去,用四个、五个甚至更多汉字起名,在府谷就类见不鲜了。如“张花老猫”、“五三米蛆”、“李二狼啃不动”、“刘五王不留”、“马屎卜浪(棒)”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值得一提的是,府谷人用最不值钱、最丑陋的物件、字眼给孩子起名,如“屎克螂”、“米蛆”,“屎卜浪”等,意在让这些神鬼不要、最不值钱的东西,会长留世上,健康永年。但是,它却超越了汉人的起名习惯,带上

了独特的民族色彩。

至今,府谷群众口头流传的方言,和内蒙河套一带蒙汉杂居地老百姓说的方言相差无几,用那里的方言说,即“不离乎”。如把没主意,听信人言,比做“软耳根”;给人通风报信,出点子,比做“掏儿杂”;中途受挫折,比作“打折(音石)腰”等,比喻人事,喻体都离不开人体。还有以物喻人的,如“捻转转”(行为不主动,顺随人意的人)、“活拍子”(吹嘘说理,善于鼓动的人)、“凉壶子”(对某行业一无所能,不中用的人)等。也有以事论人的,如把推翻既定意见或既成事实,比做“抹桌子”;翻悔已定的事儿,比做“下软蛋”;采取强硬手段,比做“下铁镢”;遇事走在前头,比做“挡头阵”;一味逢迎上级和长辈,比做“浮上水”等。还有类似成语的方言,如“锥扎火燎”、“刁冰取火”、“牵马拽镫”、“一铆顶一

楔”、“钻头觅杵晃”、“满房烧酒气”、“没心圪筒”、“圪散散价”(摇晃,不稳重)、“圪飘飘(piào)价”(轻飘飘样子)、“圪低圪缩”(suǎng)(胆小害怕、畏缩不前的样子)、“圪呢(ní)圪嚷(nàng)(说话不爽利)、“凉圪荫荫”、“薄圪闪闪”(很薄的样子,亦形容能说会道)、“灰溜圪穿”(chuǎn)(色泽暗淡,不鲜亮)、“热火圪燥”(zǎo)(天热或人多,使人情绪不安)等。以上列举的方言,既有民族色彩,又有地方色彩,形象、生动而极富表现力。

参考文献

- [1] 韦 苇,张 浩. 外国谚语丛谈[J].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1983, (2).
[2] 向光忠. 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的关系[J]. 龙岩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983, (1).

(责任编辑 周 憬)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Fugu County Dialect

LI Si-m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07)

Abstract A dialect is a direct and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Fugu County dialect, which belongs to “Jin (Shanxi Province) Language Area” of the north western sub-dialect within North China dialectal region, retains not only its refined historical culture but also the folk culture of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peculiar ethnic cul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is dialect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ulture; folklore; history; ethnic group; dialect

(上接第 74 页)

A Modern Psychological Sense in the Traditional Mode

— A discussion on Jin Yong's view of love in his A Story of Books and Swords

MA Xia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The School of Press and Media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s, Xi'an, Shaanxi 710063)

Abstract The romantic love in Jin Yong's novel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raditional novels about swordsmen who are usually portrayed in a “one man, several ladies” mode, i. e. each main character possessing three or four wives. These works always end with a happy reunion. Considering the form, Jin Yong's novels do not go beyond this mode, but th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emerge with strong modern psychological sense. This renewal of the old form instills new meaning to his novels. More importantly, this way of description makes the romantic stories in his writings appear more suitable for the modern sense. And moreover, most of his love stories ending in tragedy express a different view of love from the traditional novels of this kind.

Key words Jin Yong; affection; tragedy; traditional mode; modern sense